

收稿日期:2024-03-20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儒家仁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包雅玮

(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仁学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内核得到了创新发展,绽放出新活力。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发展,以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指引,激发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实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养分。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契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文化支撑和实践路径。合理挖掘儒家仁学思想资源,能够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生机活力。

关键词: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仁学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4-0091-08

作者简介:包雅玮(1980—),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4.050

社会治理有广义狭义之分,本文所提及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广义的社会治理,涉及当代中国从基层治理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是现代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在治理层面的统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立足于中国本土资源,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而儒家仁学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养分。探究儒家仁学思想内蕴的当代治理价值,从而在传承发展中实现古为今用,能够为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整合、凝聚社会共识、应对治理危机提供丰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继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上,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此后诸多朝代皆推崇并奉行儒家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治理观念。其背后的思想核心,具体为儒家仁学思想所主张的“仁”“德”“五常”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治理理论与传统治理理论存在历史的延续性,现代“德治”和“法治”等治理理念与传统“仁义礼智信”观念有着诸多内在联系。

一、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互促进

从总体上看,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联和契合,不仅体现为儒家仁学思想能够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还表现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可以帮助儒家文化走出时代困境,它们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需要的关系。

(一)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与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与工业、农业等现代化不同,治理的现代化在当代中国语境有其特殊的背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取得巨大成就,与之对应转轨过程中传统社会规范逐步消解,而全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于是,人们在传统与当代规范中徘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迷茫,自身的价值目标与社会行为规范难以确立,社会部分个体存在精神迷茫和行为失范现象。重新构建社会规范、构建什么样的社会规范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成为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在回应、面对、解决社会治理各类问题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优势。在众多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仁学思想在古代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包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对国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凝心聚力,达成普遍的社会共识。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来源于社会主体身份地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全部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关键的便是生产关系,包括财产关系、生产分工与产品分配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与产品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经济飞速增长,商品丰富多样,但贫富差距也在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但贫富差距仍存在,即孔子所说的“不均”。“不均”引发的社会关系失调往往会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破坏正常的社会活动。社会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在发展中出现新问题,在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中促进发展。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分配问题,对于应对经济转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活力的持续。儒家仁学思想中的“均富”“安人”理念对于合理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社会治理既包含行为治理,又包含关系治理、问题治理和风险治理。其中,行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主要指通过社会规范使人们按照社会和群体的预期行事,使社会的个体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遵循社会规范生活,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社会预期的行为。历史上的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教育将儒家仁学思想及与之相对应的礼法制度灌入民众内心,使之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并体现在百姓日常起居乃至一言一行之中,使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儒家仁学思想的政治观中强调君主的“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在社会问题尚处于主观层面时便将其化解。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治理现代化都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观念,仁学思想则是孔子继承西周思想过程中最具创新意义的思想。在此思想中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并将其作为礼的理论基础,希望借此复兴周朝的礼乐秩序,使天下归于太平稳定。可以说,儒家仁学思想的本质便是探求如何将社会导向和谐稳定的有序状态,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在此过程中,孔子在已有的“仁”的内涵的基础上,以极高的智慧将“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逐步阐述,创立出自己的仁学思想,并著书立说,广收弟子,使其不断发展。

(二) 儒家仁学思想的返本开新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仁学思想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儒家仁学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理论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也不是一个既定的完成体,而是服务于远大目标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动态体系。两千多年来,儒家仁学思想不断返本开新,助推社会治

理持续发展,也使其一次次获得新生。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借由儒家仁学思想的指导,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管理化的趋势。早在隋唐时期,我国社会治理便有了管理化的萌芽,虽然这一过程极为缓慢,但根据量变必然引发质变的原理,社会治理的管理化最终突破统治型社会治理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2]85}。

儒家思想要返本开新,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将儒家仁学思想中对于森严等级秩序的追求转变为对于平等秩序的维护。这符合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趋势,更与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目标相一致。中国古代社会多元规范共存且能保持长久的稳定性,意味着其中存在着有益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的“规范体系”构建逻辑,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历史周期律”,谋求国家长治、民族复兴^[3]。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的内在契合,对于两者自身理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由“可能状态”向“现实状态”的转化。儒家仁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超越性,其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行转变的时期,却表现出对于人本身价值的重视,构建出远超其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远景。新时代探究两者的契合,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自治、德治和礼治:儒家仁学思想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4]任何国家所选择和确立的国家制度、发展道路是由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客观实际所决定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有力支撑^[5]。社会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体构成,对于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儒家仁学治理理念,不但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彰显了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儒家仁学思想要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自身需要借助时代发展这一契机实现创造性转换。现实的需要尤其是现实的治理需要,是儒家仁学思想实现创造性转换的最好契机。具体来说,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儒家仁学创新“自治”理念,激发治理内在活力;需要儒家仁学创新“德治”理念,筑牢社会治理文化根基,实现德润人心;需要儒家仁学创新“礼治”理念,凝聚治理主体价值共识,实现凝聚人心。

(一)自治: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儒家仁学理念创新激发活力

儒家仁学理念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身为出发点,不断向外延伸,构建了从“自治”“治家”到“治国治天下”的治理路径。在儒家仁学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以士绅为代表的乡土自治社会,生动展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发展路径的具体实践,成功将社会固有的自治因素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对于历代王朝政治,由相互独立的家庭及其聚集的村落,再到乡镇、郡县,凝聚成社会,各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以实现一统。在乡村社会之中,构成了一种溯源于家庭,以血缘为纽带的自治制度。这种自治体制,非常具有活力,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代社会治理急需增强自治活力。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自治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民主之治,具体表现为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为标志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构成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自治以民主为基础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为了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自治过程中尊重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社会治理的现代治理模式是治理主体从政府一元治理主体走向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新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变化需借鉴传统儒家仁学思想的自治传统,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时代要求。

(二)德治: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儒家仁学理念创新德润人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只有以人为核心,才能更好推进“人的现代化”。世界观、人生观本质上都是对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因而改造世界、完善社会、增进文明都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对于“人”的重视具体表现在治国理政上,治理者需以修身养德为本,其后推而广之,实现爱人、爱天下,最终达成国泰民安的和谐社会。

儒家仁学理念中将教化民众作为治理的基本思路,期望发挥德治教化作用来激励人们形成君子人格、平和的心态与积极参与的态度^[6]。德治,即“以德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方法。它需要治理者率先垂范,以自身为榜样,治理者通过“德”的熏陶与感染,使民众成为“有德者”,“让有德者有所得”“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获得感”。这需要保证治理者在自身日常行为、执政过程、政策实施等诸多方面都贯穿着“德”的理念,做到表里如一,令行禁止,这是政治治理的关键所在,是推动社会善治的动力所在,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的道德品质好比是风,小人的道德品质好比是草,当风吹到草上面的时候,草就必定跟着倒。在当今政治建设中,党委与政府在道德形象上树立“君子之德”对于社会道德的建设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德治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公序良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要求,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宣传社会贤达等来弘扬正气、引领民风,在实践中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着巨大作用。伦理道德秩序作为“柔性力量”是内在和隐形的,为良好的社会风气、文明的公民素养提供社会行动支撑,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为了确保“仁政”理念的具体施行,儒家先贤以自身高尚道德要求为模板,设立了选才识贤的标准,保障社会机制运行的稳定。孔子认为社会治理需要“举贤才”,让德行完善、能力强的贤才担任治理的引导者。贤才需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主张“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君主要有求贤若渴的急切,使贤者获取到一定地位与治理权力,让众人得以观摩效仿,同时要使贤者所处的岗位适合其才能,能够在道德上垂范、业务上取得成绩。荀子认为“尚贤使能”“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把“德”与“能”作为考察治理管理者的重要依据,德是成为官吏的门槛,决定其所处的岗位取舍。《毛诗序》云:“南山有台,乐得贤,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早在孔子之前便认识到贤人官吏的选拔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德才兼备的人是社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选贤任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这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从未改变,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三)礼治: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儒家仁学理念创新凝心聚力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礼的范围甚为广泛,大到国家体制、宗教礼仪、典章制度,小到个体生活规范、风俗习惯、行为模式,无不蕴含其内,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文化约束^[8]。礼具有规范人类言行、协调利益冲突的作用。在儒家看来,礼是构成法的基础,具有明分异、和人心的作用,“尊礼崇法”在实践中构建了社会基本规范体系,维护社会和谐。儒家思想主张个体“克己复礼”,以个体道德贴合社会伦理构建和谐社会,达成国家治理,最终契合天地大道。对于治理者,儒家认为其道德水平必须“德配天地”。礼治社会对执政者和普通百姓共同的道德约束使得“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地位得以凸显^[9]。礼治的核心理念在于“德”与“仁”的统一,内在包含了个体自身修养的维度,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进行言行约束。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通过各行其礼确保长幼有序的社会和谐。礼治强调社会伦理,使得国家、家族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稳定和谐。当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追求可以在传统的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中得到一定启发。“孝”是百善之先,“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是社会领域的根本性准则,“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孝”是作为人伦道德之基的社会共识,荀子以“礼”来规约人伦关系,尽孝、守孝是“礼”的规约下的行动表现。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需要关注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礼治智慧,把握凝聚共识的社会力量。“礼”属于社会公德范畴,包括各种社会公约、守则等行为规范。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传统礼治精神的继承体现在乡村、市域治理模式拓展和举措创新。推动儒家礼治思想融入日常实践,有利于营造良好的道德人文社会环境和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推进传统礼治精神融入现代中国式社会、生态、外交治理模式。

三、从治理理念现代化到治理能力现代化:儒家仁学思想在推进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现实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0]充分发掘儒家仁学思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其具体价值贯穿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从治理理念的运用到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延伸到整个治理机制,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上。

(一)儒家仁学思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德治服务型社会,坚持“人民本位”的仁治思想,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共治共建共享”理念。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在社会治理的观念上改进,以仁为本,确立“人民本位”,认识到国家是人民拥护组建的国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从而在治理实践中不断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

儒家仁学思想通过对“仁”的阐发,以伦理关系为本源提出“人本位”的价值要求。“人本位”即当下提倡的“以人为本”,与当前政府的服务价值取向一致。社会治理中的“人本位”价值取向以服务形式体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及人民素质水平的约束,儒家仁学思想的“仁治”理念及对“得民则昌,失民者亡”的发现,形成了影响中国数千年治理国家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出现于西周,在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儒家发展逐步成熟,到明清时期形成较为完善的思想体系。其提倡君王执政时要秉持“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仁学观念,民众对于政治的作用就像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社会治理离开人民的支持参与便是鱼出水而亡,必然导致失败。孟子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贾谊认为,“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国家的安危、存亡取决于人民,政令施行的根本同样是人民。唐太宗李世民经历创业守业之双重艰辛后,深刻体会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政策与百姓幸福,社会治理与百姓参与始终是一个整体。以仁治为本,执政为民,治理为民,听取民众意见,让民众参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共建共治共享中,才能使社会治理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需要树立仁的理念,让治理体系中的全部成员理解仁的必要与价值,好德睦邻,使他们的行为合乎道德标准,满足伦理关系健全的要求^{[2]252}。服务型社会离不开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让政府看到个人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并拥有自我管理的需求,从而转变政府职能。

(二)儒家仁学思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主体是多元的。社会治理体系同样是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仁学思想认为家国对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有密切联系。对于社

会治理、家国兴亡,每个人都应义不容辞地将其担负在肩。“义”要求社会治理中的每个个体都有参与的自觉意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具体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则由社会个体的能力决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明确国家和社会的互动结构,调和党组织、政府、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使其既能各司其职,又能互相协助,即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支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儒家对德的需要有利于今天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巩固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在这一体系中必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完善人大、政协、政府、各类社会组织的制度,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方面及全过程。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广、任务重,必须促进职能优化,保障政府高效运行,理顺各部门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职能配置,完善运行机制,形成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要求的党政群机构新格局。

(三)儒家仁学思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

社会治理机制指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运行过程。社会治理机制的建立既有助于社会治理产生自适应系统,迅速应对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使得机制内的各个部件能够顺畅地表达社会利益需求,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准确、全面地进行反馈。社会治理机制的构成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和协调运行机制。

儒家仁学思想强调的“仁者爱人”“立法公正”,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仁者是儒家治国理政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要求,是有德行、有恩情的人。此类治理者以安民、富民为目标,以德立身处世,对百姓施以恩情,保障民众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尚书》中五帝之一的禹有言:“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国家治理者需了解百姓需求并心怀仁德,致力于消除各种自然危害和社会危害,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维度体现在法治,在儒家仁学思想中,对法令也是十分重视的,并且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法治思想。自周公开始便认为,要认真慎重对待治狱之事,绝不能滥用刑罚,要使得刑当其罪。儒家一向主张断狱用刑都要公平正直,不枉不纵,如《礼记·大传》云:“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荀子主张刑罚应当与所犯罪行相一致,“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即立法与立德一样,需讲求中庸之道。儒家思想中的法治还强调,在上位者需有大德,其触犯法律同样当用严刑。这一法令要求,既给予民众威慑,使民众认识到法律的威严无私,又增长了政府官员的廉政之风。为了更好地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机制,还需要形成整齐划一的行动标准,这需要吸收儒家仁学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以明确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为目标。社会治理体制可以从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手段等四个方面展开。以儒家民本思想为线索,可以贯穿社会治理各个方面。治理内容方面,建设基层信息化服务平台,做到上传下达,同时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及时了解、积极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提升治理主体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能力。治理主体方面,明确各个治理主体职责,加强技能培训,加强治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治理过程方面,应当法治化、透明化,只有保证治理主体充分了解,才能促进其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参与,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治理手段方面,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将智能化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治理工具,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及时造福于民。此外,儒家仁学思想中“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社会治理危机预防措施,对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四)儒家仁学思想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

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归根结底是治理能力上的困境。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城乡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城乡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基础通用标准、管理服务标准和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标准的多元特性和协调过程来有效激发社会活力,进而形成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以依法治理为核心,其他治理手段为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治理能力困境一方面体现在法治的刚性不够完备,另一方面,德治的随意性难以适应多元动态的社会诉求,此时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礼”和“智”起到弥补作用。

“礼”需要行动体现,表现为自治者的行动实践。儒家重“礼”,建构了博大精深的礼学,以及影响深远的礼法秩序,其既包含了家国天下的大公,也包含了家庭亲友的小私,成为人们日常起居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基本标准。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在儒家看来,“礼”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如果对于礼仪没有一定的了解,个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将寸步难行。孔子及其后人始终倡导礼乐复归,对于人们的一切行为“齐之以礼”,让人们在“礼”的规范和约束之下,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此实现社会的规范秩序。在国家层面,则凭借礼治达成“经国家、定社稷”“别贵贱、序尊卑”的重要作用。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孟子·离娄上》)一个人言行上不能遵守礼义,便是自暴自弃,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断绝,脱离社会,引发动荡。荀子更是提出“隆礼”的思想,把礼作为修身、日常起居的重要内容:“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侵;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修身》)更将礼和法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社会治理的必要与常用手段:“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更将礼放在法的前面,认为其是社会治理的起点:“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并提出治理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礼者,治辨之极也。”(《荀子·议兵》)在儒家仁学思想中,“礼”是最普遍、广泛、根本的为人之道,是为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行为准则,更是社会达成稳定和谐时人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准绳:“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决定了任何行动的展开都离不开“智”,它是影响行动能力及效率的重要因素。儒家仁学思想中对“智”的强调,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减少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儒家仁学思想对“智”的重视首先表现在重视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将社会标准根植于每一位公民的思想及言行举止之中。孔子被称作“万世师表”,一生四处奔走致力于恢复礼乐,通过旅途中的授业解惑,将自身学说思想广泛传授,使得“三代”的礼乐不衰并遍及平民,从而打破了旧时代对于知识教育的垄断,促进了士阶层的出现,普及了教育,在后世树立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对教育的重视,延伸出科举制,使得官员选聘更具有针对性与精细化。政府选拔官员,依据职位类别不同,要求应试者需了解法律、文书、数算、历史、礼仪等诸多内容。通过考试的选拔,挑选出熟悉法令礼仪的专人,使得政府管理部门内分工明确,专业性、技能性更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治理能力。

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契合,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去理解二者,在现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去实事求是地检验,才能真正明晰两者相契合的内在逻辑。只有将儒家仁学思想放入解决当前问题的深层现实维度之中,继承古今相通的“民族智慧”,才能够真正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 张康之. 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3] 杜鑫. “规范体系”构建何以可能: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多元稳定性的历史证成[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71 - 77.
- [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9 - 11 - 06(1).
- [5] 赵睿.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探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10 - 16.
- [6] 李建伟, 王伟进. 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目标与路径[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1(5): 35 - 44.
- [7] 尹丽蓉.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EB/OL]. (2023 - 01 - 16)[2023 - 03 - 07].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3-01-16/doc-imyaf5847875.shtml>.
- [8] 宣朝庆. 社会治理传统的再发明:以礼治为核心的分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5 - 17.
- [9] 彭新武, 周瑞春.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20 - 27.
- [10] 习近平.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EB/OL]. (2014 - 10 - 13)[2023 - 03 - 07].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4/c64094-25827156.html>.
-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9.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Benevolenc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BAO Yawei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kernel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benevolence, such as benevolence, justice, propriety, wisdom and faith, has been innovated, developed and reinvigorat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benevolence, answering the major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times and practice, stimulating the initia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benevolence and theory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rovides cultur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Confucian thought on benevolence can boost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on benevolence; contemporary value

〔责任编辑:朱 根〕